

中 华 版 古 典 小 说 宝 库



三國志演義

醉耕堂本四大奇书第一种



《三国志演义》(四大奇书第一种)康熙醉耕堂本扉页

前 言

一、一对“忘年交”

小说家的社会地位，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里，得不到应有的尊重。尽管他们的作品流传普及，他们塑造的人物形象和他们编织的故事情节脍炙人口，但他们的姓名和生活情况，却鲜为人知。因此，有关他们的资料很少保存下来，以致我们今天对他们的生平事迹还是知之不多，有些方面甚或是一片空白。

《三国》（《三国志演义》的简称，下同）的作者罗贯中不就是这样吗？

但和其他著名的小说家（例如《水浒传》作者施耐庵、《西游记》作者吴承恩、《金瓶梅》作者兰陵笑笑生、《红楼梦》作者曹雪芹）比较起来，他还算是幸运的。

不管怎么说，他的姓名总是和《三国》牢固地联系在一起的。在这一方面，他还没有遇到过挑战。不像吴承恩那样，是不是《西游记》的真正的作者，直到今天，还在不断地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争议。也不像曹雪芹那样，最近还有人想剥夺他的《红楼梦》著作权，而把伟大作家的桂冠献给另一个冒出来的叫做曹溯的人。

在现存《三国》最早的刊本上，明确地题署着两行字：

晋平阳侯陈寿史传^①

后学罗本贯中编次

第一行字,表明素材来自何处。第二行字,向读者指出作者是谁。依据中国古代小说刊本或目录题名的通例,“编次”一词在这里不仅含有“编辑”的意思,而且还可以解释为“撰写”和“创作”。

从署名可知,作者姓罗,名本,字贯中^②。

另一方面,罗贯中又不像《水浒传》作者施耐庵和《金瓶梅》作者兰陵笑笑生那样,除了小说上的孤零零的署名之外,其他一切(包括真实的姓名、确切的生卒年、凿凿有据的生平事迹等等)都留给后人去作考证,或者去作驰骋想像力的话题了。

罗贯中的幸运就在于,他有一位“忘年交”。

六十多年以前,天一阁旧藏明蓝格抄本《录鬼簿·录鬼簿续编》被几位辛勤访书的学者发现了^③。令人惊喜的是,在《录鬼簿续编》中,赫然列有罗贯中的小传。

关于罗贯中,传世的资料不多。而最早、最全面、最详细、最可靠的资料,就要数《录鬼簿续编》中的这篇小传了。

那么,《录鬼簿续编》又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?

顾名思义,《录鬼簿续编》是钟嗣成《录鬼簿》的增补本。

《录鬼簿》是一部记载元代戏曲家的生平事迹、作品目录的专著。它的版本系统,有简本、繁本、增补本之分^④。简本著录作家一百一十三人,繁本著录作家一百五十二人,增补本著录作家一百五十一人。天一阁旧藏明蓝格抄本即增补本。

增补本的增补工作,主要由贾仲明进行。他的增补,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:一,增补了八十余首吊词;二,在剧目下,增补了若干“题目正名”;三,补撰《录鬼簿续编》^⑤,附于《录鬼簿》原书之后。

贾仲明是什么人呢?

贾仲明，一作贾仲名，自号云水散人、云水翁，淄川（今属山东省淄博市）。

他是元末明初著名的戏曲作家。著有杂剧十四种，现存五种。他还是一位散曲作家，著有散曲集《云水遗音》，已佚失不传。

他的突出成就，却在于《录鬼簿续编》一书的编撰。这也是他对中国戏曲史所作的最大的贡献。他不愧为古代的一位优秀的戏曲目录学家。

他在《书录鬼簿后》一文的末尾，题署“永乐二十年壬寅中秋，淄川八十云水翁贾仲明书于怡和养素轩”。这就告诉我们，在明代的永乐二十年（1422），他的高寿是八十岁。古人自称“八十”，有时是指八十岁整，有时则仅仅是举成数而言，实际上指八十岁上下。若按八十整岁计算，逆推的结果是：他实生于元代至正三年（1343）。

所以，他是罗贯中的同时代人，更是罗贯中的朋友。他又是罗贯中小传的作者。单凭这短短的一篇罗贯中小传，应该承认，他已对中国小说史研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作为《录鬼簿》一书的补充，《录鬼簿续编》记载了元末明初戏曲家的生平事迹、作品目录。它著录作家七十八人。内容丰富，资料翔实。它的可靠性的程度相当高。试想，记录者和被记录者都是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，发生舛误的可能性难道不是十分微小的吗？

罗贯中小传位于《录鬼簿续编》的卷首。从排名顺序上看，第一名是钟嗣成，《录鬼簿》的编撰者；第二名便是罗贯中。这反映了罗贯中在贾仲明心目中的重要的地位。

罗贯中小传的全文如下：

罗贯中，太原人，号湖海散人。与人寡合，乐府、隐语极为

清新。与余为忘年交，遭时多故，各天一方。至正甲辰复会，别来又六十余年，竟不知其所终。

这篇小传，篇幅虽短，内容却很宝贵。它向我们透露的消息，有这样几点：

一，罗贯中不但是一位小说家，而且还是一位杂剧家、散曲家。他和许许多多的伟大的作家一样：他们往往是博学多才的，他们的成就和贡献也常常是多方面的。

二，罗贯中的故乡是山西太原。在元代，有很多山西籍的杂剧作家。我们可以举出一连串的名字，例如：李寿卿、刘唐卿、于伯渊、赵公辅、李行甫、狄君厚、孔文卿、石君宝、郑光祖、乔吉，等等。在中国戏剧史上，或在中国文学史上，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突出的现象。

三，他生活于动乱的年代，背乡离井，四方漂泊，没有功名，也没有在官场干过事，故以“湖海散人”自称。

四，他的性格的特点是“与人寡合”，有一点儿孤僻的味道。

五，他的戏曲作品的风格，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：“清新”。

六，他和贾仲明是“忘年交”。忘年交，是指不受年龄或辈分的拘限而成为亲密的朋友。这表明两人的年龄相差很大，起码要在二十岁上下。具体用在罗、贾二人身上，可以有两种解释：甲，贾仲明的年龄大于罗贯中；乙，或者，罗贯中的年龄大于贾仲明。

七，他们二人曾在至正甲辰那一年会过面。至正是元代最后一个皇帝的最后一个年号。甲辰，即至正二十四年（1364）。再过四年，就是明代正式开始的第一年，即洪武元年了。

八，贾仲明如果生于至正三年，则在至正二十四年为二十二岁。因此，“忘年交”的解释只有一种能讲得通，即：罗贯中的年龄

大于贾仲明。而另一种解释(即:贾仲明的年龄大于罗贯中)显然难于成立,因为二十二岁的贾仲明不大可能去同一个幼小的孩童会晤、谈心和订交的。

试以罗贯中的年龄大于贾仲明为前提,进一步推算罗贯中的生年。如果罗贯中在至正二十四年为四十岁(比贾仲明大十八岁),则他大约生于元代泰定二年(1325);如果罗贯中这一年为五十岁(比贾仲明大二十八岁),则他大约生于元代延祐二年(1315)。

如果罗贯中生于元代泰定二年,则在明代洪武元年时,他是四十四岁。如果罗贯中生于元代延祐二年,则在明代洪武元年时,他是五十四岁。

罗贯中的卒年不详,在目前尚无法推知。

框定了罗贯中的生年之后,就可以有根有据地确认:罗贯中是一位生活于元末明初的作家。或者说,他是一位属于十四世纪的作家。

二、晋、浙、鲁、赣

尽管有了罗贯中小传,他的生平事迹仍然遗留下两个人们感兴趣的、尚未最终解决的问题。一个是他的籍贯,一个是他的著作。

关于罗贯中的籍贯,在学术界,目前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说法。主要有山西太原、山东东平、浙江钱塘、浙江慈溪、江西庐陵五说。

应该怎样来看待这些不同的说法呢?

一,“太原”说。

“太原”说的根据在于贾仲明《录鬼簿续编》的罗贯中小传。它明白无误地指出,罗贯中是“太原人”。

我认为,这是最正确的、最可靠的说法。

贾仲明是罗贯中的同时代人,又是罗贯中的朋友。他的说法,如果没有出现确凿可靠的、坚强有力的反证,应该有着最大的可信性。

二、“钱塘”说

罗贯中的籍贯,在明代嘉靖时人的笔记中,田汝成说是“钱塘”^⑤,王圻说是“杭州”^⑦,郎瑛则笼统地说是“杭人”^⑧。清人笔记同样也有笼统地说是“越人”的^⑨。这些都可以归入“钱塘”一说。

这个说法也有一定程度的可信性。因为在《水浒传》的创作上,罗贯中和施耐庵是合作者的关系,而据高儒(也是嘉靖时人)说,施耐庵是钱塘人^⑩。施耐庵、罗贯中二人都曾生活于一个地方,只有这样,他们方始能在小说创作上有携手连袂的机缘。

既然罗贯中是太原人,那么,钱塘便可能是他的流寓地了。也就是说,罗贯中的原籍是太原,寄籍则是钱塘。

三、“东平”说。

“东平”说即“东原”说。

“东平”说的根据在于蒋大器(庸愚子)的《三国志通俗演义序》。其后,从万历年间开始,众多的《三国》刊本或其他署名“罗贯中”的小说刊本便给作者增添了“东原”的籍贯^⑪。有的刊本更把“东原”错成了“中原”^⑫。

这里需要辨明六点:

第一,这些刊本的刊刻年代都比较晚。

它们一共十六种。其中,十二种为明刊本,四种为清刊本。而十二种明刊本中,有八种刊行于万历中、后期,另四种则刊行于万历之后。

第二，蒋大器本人的时代也比较晚。

他的那篇序文写于弘治七年(1494)仲春。他是成化、弘治年间人，距离罗贯中的时代将近百年之久。

在蒋大器之前，在弘治七年之前，我们还没有发现，曾有人提出过罗贯中是“东原”人或“东平”人的说法。

第三，蒋大器的话并不可靠。“东原”二字实有错讹的可能。

试看蒋氏的原文：

若东原罗贯中，以平原陈寿传，考诸国史，自汉灵帝中平元年，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，留心损益，目之曰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。

其中，有四个专门名词，“东原”、“平原”、“中平”、“太康”，两个是地名，两个是年号，颇为缠夹不清。

请注意：紧接于“东原罗贯中”之后，有“平原陈寿”四字。

陈寿明明是安汉（今四川省南充市）人^⑬。蒋大器却谬误地称陈寿为“平原”人。平原乃西汉所置之郡，其地在今山东省境内。安汉与平原，相隔有千里之遥。陈寿不但没有出生在平原，没有生活在平原，而且也没有在平原做过官。蒋大器竟把一位四川人无端地说成了山东人。

他既然能够把陈寿这位四川人说成山东人，安知他不能够把罗贯中这位山西人说成山东人？

他在陈寿籍贯上犯错误的来由，恐怕是这样的：在《三国》抄本或初刊本上^⑭，像嘉靖本那样，无疑也有着“晋平阳侯陈寿史传”、“后学罗本贯中编次”两行字。蒋大器看到了“陈寿”之上的“平阳侯”三字，始而误记为“平阳”二字，继而又误写或误印为“平原”二字。

他既然能够把官名“平阳”说成地名“平原”，安知他不能够把山西“太原”说成山东“东原”？

第四，“东原”是古地名，指今山东省东平县一带。而从蒋大器序文看来，他在称呼用作籍贯的地名时，并不使用古地名。

蒋大器序文的末尾的印文，有“金华蒋氏之印”六字。金华有府、县之别。而金华县乃隋代所立之名，西汉名曰乌伤，东汉名曰长山；金华府则系龙凤六年（1360）朱元璋所改之名，元代名曰婺州路，龙凤四年朱元璋一度改名宁越府。由此可见，在蒋大器生活的那个时代，金华是今地名，不是古地名。他称述自己的籍贯时，都不使用古地名，为什么要在称述罗贯中的籍贯时非使用古地名不可呢？

这就不免令人想到：“东原”二字之中，必有误字。“太”误为“东”，实有可能。

第五，有人说，《录鬼簿续编》罗贯中小传“太原人”乃“东原人”之误。这个说法缺乏必要的说服力。

天一阁旧藏明蓝格抄本《录鬼簿·录鬼簿续编》一共著录了四位太原籍的作家：李寿卿、刘唐卿、乔梦符和罗贯中。小传中都说他们是“太原人”。前三个“太原”都没有出问题，唯独最后一个“太原”写错了？——这是很难令人相信的。

另一方面，“东原”说的主张者认为，东原就是东平。但元代东平籍的杂剧作家不少，各种版本的《录鬼簿》就著录了八位之多：高文秀、李好古、张时起、顾仲清、赵君卿、陈彦实、张寿卿和李显卿。他们的小传中，都无一例外地说是“东平人”，而没有一处说是“东原人”的。如果罗贯中真是他们的同乡，那也一定会在他的小传中写作“东平人”，而不会写作“东原人”的。这样一来，以“太原”为“东

原”之误的说法，岂不落了空？

更何况，古人的乡土观念十分浓厚。贾仲明本人就是山东人，如果罗贯中也是山东人，岂有不引为同乡，反而视为异乡人（山西人）的道理？

第六，某些万历年间或万历之后的刊本上的“东原”二字，系当时的书商所加，与作者罗贯中无干，不是他自己的题署。

有人把这两个字指认为“罗贯中本人的题署”。这缺乏依据，只不过是“想当然耳”的臆测。拿现知有此题署的年代最早的《三国》双峰堂刊本（万历二十年，1592）、《水浒传》双峰堂刊本（万历二十二年，1594）来说，二者都出于同一家书坊，而前者题曰：“东原贯中罗道本编次”，后者题曰：“中原贯中罗道本名卿父編集”。如果这也算是出于本人的题署，难道他能把自己的籍贯一会儿说成是“东原”，一会儿说成是“中原”吗？难道他能两度把自己的名字误说为“道本”吗？难道他能无缘无故地给自己捏造出“名卿”这样一个表字吗？

四，“慈溪”说。

在五种不同的说法中，只有此说是当代学者提出的。

1959年在上海发现了元代理学家赵偕的文集《赵宝峰先生集》。此书的卷首载有一篇至正二十六年（1336）十二月十三日的《门人祭宝峰先生文》。署名的门人共三十一人，包括“罗拱”、“罗本”兄弟二人在内。赵偕以及“罗拱”、“罗本”都是慈溪人，——这就是“慈溪”说的依据。

天下同时、同姓、同名的人不在少数。若要证明这一位“罗本”即是那一位罗本，即是《三国》的作者罗贯中，还需要另外举出确凿可靠的、坚强有力的证据。仅仅因为同时、同姓、同名而匆忙断定

某甲和某乙为同一人，那是远远不够的，也是无法取信于人的。“慈溪”说的最大的缺陷，即在于此。

慈溪罗本，有表字曰“彦直”^⑮。而《三国》作者太原罗本，字“贯中”。表字不同，他们能是同一人吗？罗彦直非罗贯中。

慈溪罗拱，字彦威，号常明子，乃罗本之兄，“慈之杜湖人”^⑯。胞兄是杜湖人，胞弟当然也是杜湖人。是慈溪人，而偏偏要特别指出他们是慈溪境内的杜湖人（也就是说，不是慈溪境内的别的什么地方的人），这意味着他们世居于杜湖，是在杜湖其地土生土长的。

戴良《九灵山房集》有一篇《书画舫宴集诗序》和一首《寄罗彦直》诗。从这两篇作品可以窥知，罗彦直是个家境丰饶的书画收藏家，所居名“书画舫”；洪武二年（1369）十月，戴良等人曾在“书画舫”饮酒赋诗。其时，罗彦直久居于慈溪的石画舫中，过着优游自在的生活。

而《三国》作者罗贯中却自号“湖海散人”，是个离乡背井的漂泊者。他和罗彦直完全是两路人。

赵偕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。罗彦直以之为师，显示了他对理学的向往和追求。这也是和《三国》作者罗贯中大异其趣的。从《三国》所反映的思想看，罗贯中和理学是根本搭不上界的。

五，“庐陵”说。

庐陵即今江西省吉安市。罗姓乃当地的望族。

“庐陵”说的根据在于《说唐演义全传》的题署。但这并不可靠。因为：第一，《说唐演义全传》，共六十八回，它根本不是罗贯中的作品。第二，《说唐演义全传》现存最早的刊本刊行于清代乾隆四十八年（1783）。

怎么能根据一个晚出的、伪托的作品来确定罗贯中的籍贯呢？

在当前的学术界，此说影响不大。

以上五说，按其提出的时间顺序排列如下：

太原说——东原说——钱塘说——庐陵说——慈溪说
而以最早的“太原”说为最可信。

三、哪些是他的作品

罗贯中有哪些著作？除了《三国》，他还写过哪些小说？

罗贯中的著作，主要是小说和杂剧。另外，还有散曲和“隐语”。

贾仲明《录鬼簿续编》罗贯中小传提到了他的“乐府”和“隐语”。按照当时的习惯用法，乐府指的就是散曲。隐语何所指，则不详，或许是谜语之类？

罗贯中小传还著录了他撰写的三部杂剧作品：《赵太祖龙虎风云会》，《忠正孝子连环谏》和《三平章死哭蜚虎子》。其中，《连环谏》和《蜚虎子》两部佚失不传，它们的内容已无法详知。只有一部《风云会》完整地保存了下来。

《风云会》见于抄本《古名家杂剧》，现有《古本戏曲丛刊》四集影印本、《元曲选外编》排印本（中华书局，1959年，北京）。它的“题目正名”乃是：“伏降四国咨谋议，雪夜亲临赵普第，君相当时一梦中，今朝龙虎风云会。”全剧共四折一楔子。第一折至第三折，正末扮赵匡胤；第四折，正末扮赵普。在作者的安排下，赵匡胤、赵普二人成为全剧的中心人物，故事情节正是围绕着他们二人展开的。

罗贯中的《风云会》杂剧和他的《三国》小说有着若干相似之处。它们都同样歌颂了贤明的、时刻以社稷与苍生为念的君主，也同样歌颂了那些忠心耿耿、建功立业的将相王侯们。赵匡胤不就是刘备的影子吗？赵普、苗训不就是诸葛亮的影子吗？赵匡胤和曹彬、郑恩等人的结义兄弟关系，不就是桃园三兄弟的写照吗？

在《风云会》和《三国》之间，从主题思想到人物形象，在某种程度上，人们都能发现有趣的、巧妙的重合。它们是出于同一个作家笔下的两部作品。因之，这种重合的呈现决不是偶然的。也就是说，《风云会》不但有助于我们对罗贯中这位伟大作家的思想、艺术成就的认识和评价，而且还有助于我们对《三国》这部伟大作品的思想、艺术特征的认识和发掘。

罗贯中是伟大的小说家。他的代表作，当然是小说《三国》。据明人说，罗贯中编撰的小说竟有“数十种”^①。数量之多，令人惊讶。惜乎我们今天无缘目睹全豹。我相信，这恐怕是一种张大其词的妄说。我们能看到的被说成是罗贯中作品的小说，实际上只有下列四种：

1. 《隋唐两朝志传》
2. 《残唐五代史演义传》
3. 《三遂平妖传》
4. 《水浒传》

它们到底是不是罗贯中的作品呢？

《隋唐两朝志传》，十二卷，一百二十二回。现存万历四十七年（1619）龚绍山刊本，题“东原贯中罗本编辑”“西蜀升庵杨慎批评”。

《残唐五代史演义传》，六十则。刻本甚多，其最早者刊行于明

末。题“贯中罗本编辑”。有八卷本、六卷本、十二卷本之分。八卷本题“李卓吾批点”。六卷本、十二卷本题“玉茗堂批点”。

《三遂平妖传》，四卷，二十回。题“东原罗贯中编次”。现存两种：一为残存两卷本，刊行于万历年间；一为完整本，第一卷至第三卷题“钱塘王慎修校梓”，第四卷题“金陵世德堂校梓”。完整本，孙楷第判断说，“书刻在万历二十几年”^⑧。但，此本封面题“冯犹龙先生增定”。而冯梦龙生于万历二年（1574），至万历二十五年（1597）时，年方二十四岁。此时前后，他似无可能去做“增定”的工作。冯梦龙增补四十回本刊行于泰昌元年（1620）之后。故知以“冯梦龙先生增定”为号召的王慎修·世德堂刊本的刻印、销售不可能早于此一年。

《水浒传》，署名罗贯中的刊本，主要有三种。一，北京图书馆藏白棉纸残本。残存八回，其中五回系郑振铎旧藏，三回为敝帚斋旧藏，据说是“嘉靖间刻本”或“嘉靖间武定侯郭勋刻本”^⑨。二，天都外臣序本。序文撰写于万历十七年（1589），现存清代石渠阁补刊本。三，袁无涯刊本。约刊行于万历四十二年（1614）。这三种刊本均题“施耐庵集撰”、“罗贯中纂修”。同时，嘉靖年间的《百川书志》所著录的《忠义水浒传》，也说是“钱塘施耐庵的本，罗贯中编次”。

怎样判断这四部小说是不是罗贯中的作品呢？

不妨分两步走。先立下一个判断真伪的标准，再来讨论某些细节。

在没有确凿可靠的文献资料的情况下，可以根据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历史的实际进程，根据中国古代小说刊本的演变规律，在年代上寻找出一条分界线来。

我们注意到,在明代,在小说刊本上,伪托作者的姓名,或者乱题作者的姓名,这种现象是从万历年间(1573—1620)开始流行的。因此,分界线便可划在万历之前的隆庆年间(1567—1572)。在这之前,包括嘉靖年间(1522—1566),这种风气还没有出现。其时,小说刊本上关于作者的题署,书目上关于小说作者的著录,应该承认,是比较可靠的。

这个标准,如果能被大家接受、同意,那么,就可以用它对上述四部小说进行初步的判断了。显然,只有《水浒传》在这个分界线之前,其余三部小说都在分界线之后。也就是说,需要把《水浒传》单独地脱离出来,它的作者之一非常可能是罗贯中。而现存的《隋唐两朝志传》、《残唐五代史演义传》和《三遂平妖传》倒不一定是罗贯中的作品。

试从三个方面来作进一步的分析。

第一,现存最早的《三国》刊本分则而不分回,由此不难推知,《三国》原本必然也是如此。《隋唐两朝志传》、《三遂平妖传》正和这一点抵触。它们分回而不分则。这遂成为它们晚出的一个标识。

第二,刻印小说而配以名人的评点,也是万历以迄明末的风气。较早的李贄(1527—1602)评本出现于万历年间。其后,陆续有“李卓吾”、“钟伯敬”、“汤显祖”、“杨升庵”、“陈眉公”等人的评本应市。其中绝大部分是书商玩弄的伪托作者、评者或乱题作者、评者的把戏。《隋唐两朝志传》、《五代残唐演义传》和《三遂平妖传》等书的先后问世,正反映了这种风气的传播之广。

第三,上文业已指出,关于罗贯中的籍贯,“太原”是记载年代最早的、最可靠的说法,“东平”(“东原”)则是后起的、舛误的说法,

其始作俑者为《三国》嘉靖本所刊载的蒋大器的序文。某些书商蹈袭蒋氏的说法，把“东原”二字题署在某些《三国》或其他小说的刊本上，则始于万历年间。《隋唐两朝志传》、《三遂平妖传》二书以“东原”充为罗贯中的籍贯，恰好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：它们的底本可能不是罗贯中的原本，甚至可能与罗贯中无关涉。

这三部小说是否罗贯中的作品，大体上是比较一致的，但仍有细微的差别。在我看来，《隋唐两朝志传》和《三遂平妖传》的不可靠性更甚于《五代残唐史演义传》。

那么，《水浒传》是不是罗贯中的作品呢？

从刊本的题署和书目的著录看，在施耐庵名下的是“集撰”和“的本”，在罗贯中名下的却是“纂修”和“编次”。二者迥然不同。从语义上分析，这两组词意有明显的区别。仔细比较一下，即可看出：施耐庵是作者、执笔者，而罗贯中只不过是整理者、编者而已。

因此，从狭义上说，施耐庵是《水浒传》的作者；从广义上说，《水浒传》是施耐庵、罗贯中二人合作的产物。

《三国》和《水浒传》的语言形式不同，前者是浅近的文言，后者却是通俗的白话。这就很难令人相信，它们竟会出于同一人罗贯中的笔下。

有人坐实了施、罗二人的具体的分工，把前七十回的著作权给予施耐庵，而把后五十回的著作权给予罗贯中^⑨。不言而喻，这仅仅是一种凭空的猜度。它出现的时间太晚，不足为据：只有在明末清初之后，在一百二十回本、七十回本流行之后，它才可能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。